

**Liberty and Democracy in Chinese Perspective**


- ▲ National Identity Paths of Intellectual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 ▲ Liberal Tradition in Zhuangzi

**Operation of Power: Possibilities in Institu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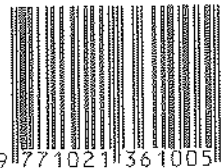
- ▲ The Programmes of Changhua County Magistrates
- ▲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Collective Action: A Case in Zhejiang
- ▲ Normative Standpoints of the Court in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Book Reviews: Political and Legal Aspects of "China Dream"**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ISSN 1021-3619



9 771021 361005

第四十七期

二〇一四年 秋 / 冬季

**自由民主的中國觀**

- ▲ 港台知識份子的國族認同
- ▲ 《莊子》有關自由傳統的政治哲學

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

**權力操作：制度的可能**

- ▲ 彰化縣選舉政見的實證分析
- ▲ 浙江集體行動中的政治機會
- ▲ 佛教行政訴訟的實然與應然

**書評特輯：中國夢的政與法**

- ▲ 《司法、政治與社會：中國大陸的經驗研究》
- ▲ 《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
- ▲ 《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
- ▲ 《四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四十七期 2014 年秋 / 冬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47 Autumn/Winter 2014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選登題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香港城市大學 2014

本學報版權為香港城市大學所有。  
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學報文字或圖表。

國際標準刊號：1021-3619

出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ISSN: 1021-3619

Publish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 目 錄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四十七期 2014 秋／冬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47 Autumn/Winter 2014

### 自由民主的中國觀

殖民之後：港台知識份子的國族認同案例研究..... 1

邵軒磊 李徽典

自由傳統的本土根基：對《莊子》內七篇的  
政治哲學解讀..... 29

黃 芸

### 權力操作：制度的可能

縣市長選舉政見的實證分析：彰化縣個案研究..... 85

黃國敏

集體行動中的政治機會感知及運用：

以浙江華鎮為例..... 119

邵燕華

勞教行政訴訟的實然與應然：

實證主義的分析..... 139

儲東城

## 書評特輯：中國夢的政與法

林端、侯猛、尤陳俊編：《司法、政治與社會： 中國大陸的經驗研究》 .....	167
滕彪	
許志永著，滕彪、華澤編：《堂堂正正做公民： 我的自由中國》 .....	181
鄭宇碩	
張博樹：《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 .....	185
鄭宇碩	
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合編：《胸懷祖國： 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	190
鄭宇碩	
鳴謝 .....	194
撰稿體例 .....	195
英文目錄 Contents .....	inside back cover 封底內頁

## 稿例

- 1 研究論文來稿以二萬字為限（註釋在內）。本刊亦歡迎評論論文、研究筆記、短論等各形式之文稿。
- 2 本刊歡迎任何中、英文社會科學論著，以及其它語文之中、英文譯本之書評；所選著作於近一年內出版更佳。來稿以三千字為限。本刊希望書評以評論為主，內容簡介部分不超過全文篇幅四分之一為佳。
- 3 來稿請用中文打字，每頁以一千字為限，並請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文稿電子檔。
- 4 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所屬學校機構及職稱），並附電子郵件、通訊地址、電話或傳真等聯絡資料。
- 5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審議權及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 6 來稿請自備副本，本刊一概不退還稿件。本刊對有意作進一步處理之來稿，均於三個月內交付評審報告。逾期末獲通知者，可自行處理稿件。
- 7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 8 來稿必須未經發表；本刊亦不接受一稿兩投。
- 9 任何來稿若與上述條件有別，作者須在交稿時向本刊詳細說明，由本刊作斟酌及最後決定。

## 審稿章則

- 1 所有論文來稿皆先由總編輯或其委託人審閱，經初步認可後即送交編輯委員評審；後者亦可轉介其他學者負責評審。稿件採用與否由總編輯作最後決定。
- 2 評審基本上將稿件分為四類：應予採用；可考慮採用，惟須修改；須作大幅修改，再作評審；及不適宜採用。
- 3 評審標準純粹以學術價值為依歸。參照國內外嚴肅學術期刊慣例，本刊要求稿件在理論上有所創新發展或提出建設性評論，又或在資料搜集及分析上作出貢獻。文章選題能配合本刊創刊宗旨者，優先採用。
- 4 本刊採雙向不記名審稿法（書評及論壇除外，由執行編輯部議定）。

#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編輯委員會

- |                    |                              |
|--------------------|------------------------------|
| 朱立                 | 台灣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
| 何衍基                | 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席教授             |
| 吳嘉寶                | 日本新潟縣立大學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
| 李強                 |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
| 李亦園                |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院士                 |
| 李明堃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前教授            |
| 李清潭                | 台灣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
| 李鴻永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科學系教授           |
| 周永新                |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
| 邱垂亮                |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科學及國際研究學系<br>榮譽研究顧問 |
| 金耀基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
| 馬戎                 |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
| 陳弘毅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
| 陳其南                | 台灣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教授          |
| 黃有光                | 澳洲莫納石大學經濟學系講座教授              |
| 黃佩華                |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 黃紹倫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
| 楊國樞                |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
| 趙全勝                | 美國大學比較及區域研究學部主任              |
| 劉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
| 鄭宇碩                |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科學講座教授               |
| 鄭竹園                | 美國印第安那州州立博爾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
| 蕭新煌                |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 關信基                |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
| 蘇耀昌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           |
| Andrew Nathan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
| Jean-Philippe Béja |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
| Jonathan Unger     | 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中心主任               |
| Lynn White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總編輯 鄭宇碩  
 執行編輯 羅金義  
 副編輯 陳淑媛

通訊處  
 香港九龍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計劃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傳真：(852) 3442 7328  
 電子郵件：rchkjsc@cityu.edu.hk

學報網址  
[www.cityu.edu.hk/rccp/hkjournalss.html](http://www.cityu.edu.hk/rccp/hkjournalss.html)

摘要及索引系統 Abstracts and indexing services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  
 CSA Sociological Abstracts  
 Historical Abstracts  
 Hong Kong Journal Online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  
 ProQuest  
 Scopus  
 Ulrich's Periodical Directory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  
 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  
 港澳期刊網

專業支援：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  
 Professionally supported by the Run Run Shaw Libra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殖民之後 港台知識份子的 國族認同案例研究 “After Colonial”

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Paths of Intellectual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邵軒磊                      李徽典\*  
SHAO Hsuan Lei        LEE Hui Tien

## 摘要

本文嘗試以東亞華裔知識份子——李萬居、李南雄父子的中國觀，來理解港台擺脫殖民身份後，兩人認同轉變之歷程。本文以相關官方檔案文獻、傳記、研究成果、口述歷史以及評論文章為基礎，闡釋渠等以自身實踐與「中國概念」的複雜關係，乃是知識份子置身其中，選擇建設性或破壞性地建構主體性的具體落實。本文發現，李氏父子面對自身際遇與當時政治的辯證關係時，藉由矢志西方普世價值「民主·科學」面對中國，選擇了「超越」的去殖脈絡，處理港台兩地的再解殖問題，從而彰顯自我認同。在相關研究範疇之中，本文試圖同時涵攝「台灣」與「香港」之近現代議題，做為對東亞（後）殖民研究之補充，亦期待與東亞思想研究對話。

\* 邵軒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李徽典    國立中山大學（台灣）社會科學碩士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27日；通過日期：2014年11月30日。

## 關鍵詞

後殖民主義、香港、殖民地、認同、台灣、知識份子

##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views on China of Wan-chu Lee and his son Prof. Peter N. S. Le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explain the intellectuals' national identity paths. Through official literature, biographies, research findings, oral histories, and comments of contemporary figur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and "the ideal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was the one theme that had affected post-colonial intellectuals' decision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onstructive/destructive essence.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intellectuals attempted to maintain a dialogue between their own situation and the politics above them, and us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to overcome (de-colonize) the 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s. As such, both groups could get rid of the sad context of the colonized role, a causality of the overcome process of the post-colonial dialectic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is article is a rar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issue studies, as well as a part of post-war history of East Asia.

## Keywords

Colony, Hong Kong, identity, post-colonialism, Taiwan, intellectuals

## 一 研究背景

十九世紀，香港與台灣相繼成為殖民地，此一特殊歷史經驗使得雖然「中國／中華」在政治經濟文化之影響力越發龐大，但兩地確有外於中國的主體性卻已建立。在政治經濟實踐（特別行政區／兩岸關係）上，兩地各以不同方式呈現，互動關係複雜，包括近期社會事件（如太陽花學運、佔中行動等），都起因於兩地面對中國影響力之反思。易言之，探究「中國」觀念於兩地之意義，不僅具

有知識論上的挑戰性，能協助吾人理解港台殖民性／後殖民（post-/coloniality）的內涵意義，亦有助於理解現實政治。

本文選擇以李萬居、李南雄（Peter Nan-shong Lee）兩代知識份子（Intellectual）舉例，試圖討論此一殖民／主體關係。李氏父子於台灣成長，有香港經驗，亦皆曾經歷政治壓迫，生涯內容正與「殖民／去殖」的感情密切聯繫。一方面，兩人身上之中國性（Chineseness）<sup>1</sup>，體現了一種殖民地中國觀（views of China）知識類型。另一方面，父子分別置身港台兩地，面對做為志業客體的「中國」，更決定了主體如何說明中國性存乎自己，以之界定人我，置主體性於自我解殖（decolonization of self）與即離中國（close or left）的選擇脈絡之中。準此，本文認為，殖民／主體認同關係，必然反映在其個人史的情感、選擇中。

黑格爾（G. W. F. Hegel）辯證主體之假設為：人類畢生皆有對於「認知、認同」的需求。<sup>2</sup> 進而主體充分認知自我、完成自我的依據，是存乎於「他者」對自己意義。根據文本考察，對於李氏父子之知識份子生涯，最重要的他者就是「中國」。然而，其中國觀因基於「為滿足自己的需要，獲得一定的價值」（陳先奎，2011：頁 35）的出發點，出身殖民地的李氏父子，在遇上政治壓迫環境時的殖民處境，以及與心目中「中國」之間存在的種種矛盾與複雜關係，即為研究後殖民知識的一種案例。

因此，本文試圖說明：中國觀做為李氏父子後殖民思考的重要參數，對於後殖民主體所富含的意義。其中，曾任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會議員暨副議長的李萬居，在成長、啟蒙、留學、抗戰、參政、辦報乃至組黨等行為之中，皆顯露一以貫之的中國認

1 統括中國的民族性、國民性、國民心理、文化特質的一種術語。其相關延伸概念，請參見（涂經論，2007：頁 154）。

2 即主奴辯證（master-slave dialectic）。殊死對抗的主奴雙方，都在透過（消滅）對方確認自己的存在——我是主人，因他者是奴隸。詳參 Rosen Menahem, "Identité, différence et contradiction dialectiques selon Hege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3:4 (October 1985).

同，但又因何選擇黨外路線，遠離主流政治？而其子政治學者李南雄，負笈美國，學成返回出生地香港，任教於中文大學，長年從事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等學術工作。偏好運用韋伯「三個基本模型」<sup>3</sup>等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講求理性態度及科學根據，以多元化的角度對待中國，與其父李萬居相比，大異其趣。然而，兩人又不約而同大量使用西方普世價值的言語，不斷重塑、說明、追求一種理想概念（ideal type）的中國。

本文研究兩位主要活躍於二戰後至冷戰期間的東亞華裔知識份子，並基於後殖民觀念，融合個人史、政治社會史與思想史角度，對近現代歷史做出補充。另一方面，本文也關注，長期分屬不同宗主國的港台兩地，長久以來不相熟悉，陷入論者所謂「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龍應台，2006：頁237）。此一知識上的困境，復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國際形勢的介入而更形複雜，以致雙方社會蘊含「冷戰遺留」，相互隔閡，延續至今（梁文道，2009：頁43）。因此，將「港台」與「兩代」同時並列研究，饒富學術旨趣，亦有助於理解東亞殖民／解殖觀念。

## 二 文獻回顧

有關李萬居的前人研究，於專書方面，包括成書最早但內容小說化的楊瑞先《珠沈滄海：李萬居先生傳》。但此書侷於時空背景，內容委婉隱晦處多。最具代表性的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兼具史料內容、論述、分析，較為全面。在立場上，楊著對傳主的分析、評價與楊瑞先舊著觀點一致，多強調李萬居對中國國族的認同維度，消滅了傳主「日本認同」因素。因此，本文亦着重分析李萬居認同的轉變過程。此外，2001年出版的《李萬居一百周年冥誕紀念專刊——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收錄許多學者

的論述。中興大學碩士論文〈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問政為中心〉對其生平經歷有完整考據。再輔以許雪姬〈評《李萬居評傳》〉的修正，都是本文酌加參考的範圍。前人未採的日本時代戶籍資料，也將被本文所用。有關李南雄先生，本文以口述訪談資料，以及其論文、報章評論等著作，做為研究文獻之基。

基於以上的新舊資料，本文繫於提出以兩人生涯探討「殖民」的新視角。後殖民主義，乃相對於「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李英明，2003），意謂殖民地或許在名義上的主權、政治、經濟方面取得自主，但在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知識話語和主體構成方面，仍存在一種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霸權意識（曹莉譯，史碧娃克原著，1999）（陶東風，2000）（Spivak, 1996）。<sup>4</sup> 在後殖民理論中的被殖民者，即使在主權上脫離了宗主國，但在政治、經濟甚或文化層面，仍將處於依賴與「被殖民」狀態（葉郁菁，2007：頁55-76）。其代表性意象可見諸於法農（Frantz Fanon）的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黑皮膚，白面具）一書或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著作：「賤民能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

在台灣學界，「後殖民」觀念廣泛使用於文學研究之中。1992年，邱貴芬和廖朝陽曾針對「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可能性」與「台灣文化」的屬性、內涵進行辯論。自從《中外文學》在1995年至1996年間開展「台灣後殖民性與後現代性」的辯論之後，「後殖民」更成為文學批判的基本切入點。劉紀蕙稱其為《中外文學》的「本土轉向」（張君玖，2009：頁5-44）。在文學研究領域，有論者以台灣文學的「女性」意象，做為台灣主體性欠缺的證明（張君玖，2009：頁8）。將台灣比擬為女性，將資本主義體系比擬於父權體制，是這個視角常用的理念。延伸至政治學，則有「近代中國陰性主權」的觀點（石之瑜，1995：頁24-38）。

3 此即韋伯關於權威（Authority）的論述：「魅力領導模型」（Charismatic Leadership Model）、「傳統世襲模型」（Traditional Authority Model）和「法律科層模型」（Legal Authority Model）。

4 而殖民地在獨立後，國家政治、經濟上繼續依賴西方世界的情形，則屬於「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範疇。



但仔細深究，在台灣談論後殖民，首先就須面臨「宗主國是誰」、台灣受到甚麼樣「揮之不去的宗主國文化糾纏」兩大問題。一般情況，依照研究者不同史觀，定義出不同之「宗主國」，由於讀者通常能夠心領神會，其後的論述也就順水推舟。於是，有關如何選定主體，如何確認台灣位置的精細討論，若非輕輕帶過，就是賦予後殖民現象具有嶄新正面意義（陳春燕，2008：頁 119-155）（王寧，2003：頁 19-27）（王嶽川，2000：頁 19-40）。此外，亦較少討論諸如西方的後殖民理論，能否「適用」於東亞地區？在港台的例子裏，何為殖民／後殖民，又要如何認定？港台的殖民經驗是否特殊？由於台灣殖民的性質素有爭論，<sup>5</sup> 故凡此種種，都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為此，本文試圖重新面對「殖民性」，直接討論日本、英國（西方）與中國這些大文化，之於港台知識份子的衝擊。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出發，藉由港台出身，具有港台的中國經驗，又有「中國人」認同的兩代東亞華裔知識份子，反思其間中國觀的形成與內容，藉由何種因果與脈絡，使其得以在實踐當中，思考被殖民者如何超越克服之。本文在事實研究之上，也進行理論對話，並希望提供目前身處港台空間中的香港人、台灣人，從擺脫「後殖民」理論的「殖民之後」（after colonial）個人史，尋求另一角度的理解與認識。

現時，有關台灣殖民史的研究，多以帝國時期日本為主軸，將（實質上的）日本殖民地：滿洲、台灣、朝鮮並列（王向遠，2005：第十三章），並比較其間不同（夏鑄九，2000：頁 47-82）。本文以香港、台灣做為切入參照點，對於殖民性的討論，可謂異於以往，對華文世界而言，也存在着以台灣及香港現代史理解殖民，肇生不同啟發的可能性。

5 如：陳芳明〈台灣史政治主體性的建立之歷史考察——以抗日運動為中心（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陳芳明，《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頁 27。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蘋果日報，（瀏覽：2014年1月29日）。

### 三 李萬居：民主超越殖民

#### 1 生平、學思與遭遇

李萬居，筆名孟南，1940年代曾化名李建華（陳翠蓮，2006：頁 322），祖籍福建紹安，1901年7月22日（農曆6月23日）生於台灣台南縣尖山堡植梧庄（中外名人傳編輯委員會編撰，2000：頁 7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台灣政媒兩棲的名人，以敢言著稱，曾有「魯莽書生」、「五龍一鳳」、「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等榮銜行世。

雖然置身日本的統治，中國傳統經典，仍是李萬居幼年啟蒙的基石（王文裕，1997：1）。13歲時，進一步接受前清秀才的私塾教育，奠定其國學基礎（楊瑞先，1981：頁 17-18），他也藉此開館授徒，成為「先生」。

1919年，李萬居離家南下，在嘉義布袋嘴地區擔任鹽查補時，對日本人已有不良觀感（楊瑞先，1981：頁 29）。翌年，日本警察催繳稅賦致使其母自縊身亡，對日情感更見惡化。許多經歷的沈澱之下，兩年後，力主宣揚「喚起漢民族自覺」（連溫腳，1953：頁 70）的政治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不斷舉行活動時，身為烏日糖廠員工的李氏，也就成了文協的「忠實聽眾」（楊錦麟，1993：頁 17）。

1922年，李萬居因細故，在雲林家鄉遭日警囚禁四個月，進而在兩年後的春天「退去」<sup>6</sup> 台灣戶籍，秋天前往中國上海，學習注音符號與北京話（楊錦麟，1993：頁 32）。翌年秋天，他重返上海，進入民國大學，在章太炎、胡樸安門下學習國學與西洋學術思想。當時，章太炎曾洽詢他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的意願，但被他拒絕，從而提出自己負笈法國的心願（楊瑞先，1981：頁 48）。上

6 「退去」為戶籍資料原文用字。

海時期的李萬居，也同時與 1923 年創立於法國巴黎的中國青年黨發生最初接觸。

1926 年，李萬居矢言「拯救台灣三百六十萬人」之後（楊瑞先，1981：頁 51-53），前往法國巴黎大學，專攻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史與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學說。並同時吸收自由主義的思想。1928 年冬，李萬居在法國加入青年黨。該黨主張國家主義意識型態，為他提供一種世界觀認同。可見，粗具輪廓的李萬居國族認同，乃是「反日、反共、中華民族認同」的集合，這也是他選擇積極反抗殖民者的起點。

完成學業，返回中國大陸後，戶籍資料記載，李萬居於 1935 年 3 月 15 日正式歸化「中華民國」，自此喪失日本籍。其後，投身中國抗日戰爭，任職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國研所），在中國兩廣、英屬香港及越南從事情報工作。期間更冒險引介日本反戰人士青山和夫，讓國研所成立編制外的「青山研究室」（劉曉鵬，2013：頁 150-151）。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後約一個月，李萬居與連震東等人一同代表國府，接收台灣。自此，李萬居陸續接任諸多公家、民間機關要職，並受到政府當局多次褒獎（戴宛真，2009：頁 2）。做為知識份子，以往言行時常透露反日、救國等強大動機的李萬居，在戰後，實踐民主政治成為他生涯當中的主要內容（李茂祥，2004：頁 9）。他曾如此評價被廣為詬病的制憲國大：

「... 蔣主席個人的態度... 其無隱無私，一片選政於民，實行民主的明淨決心，是所有出席國大的人誰都看得明白的。」（楊錦麟，1993：頁 162）在他眼中，已以《中國之命運》一書宣示「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國民黨亦與民主不悖：「大黨對於其他黨派的容忍與讓步，在這次會議中也十分值得稱道... 充分顯示了大黨對於其他黨派的寬容與尊重，同時也充分表示出大黨對其他黨派協調合作的民主精神... 討論的進行，相當圓滿... 從會場上熱烈爭論的情形，也可以相信這次的制憲的憲法是相當完善的... 我們只

有希望今後的政局能夠逐漸澄清，各部份尚未協調的勢力，能夠逐漸自納於統一的政治體中，在那裏面去施展各自的政治報負。」（楊錦麟，1993：頁 162）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李萬居雖然是國大代表，且身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委，身份崇高，仍然險些遭到捕殺。<sup>7</sup> 咸信此事為李萬居之認同轉變重要契機。事後，當局架空李氏在新生報社的權力之後，他選擇離職自行創辦《公論報》。日後，這份報紙與外省籍知識份子雷震的《自由中國》、在野黨的《民主潮》與《民主中國》合稱「一報三刊」（薛化元，2006：導論 VI），蔚為台灣言論自由的重要堡壘。

1960 年，李萬居以發言人的身份，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隨着雷震遭到逮捕，此一運動亦告結束。李氏僅得身免，一手創辦的《公論報》則被台北地方法院查封（陳國祥，祝萍，1987：頁 81-82）。六年後，李萬居病逝於台北台大醫院，享年 66 歲。

## 2 歐化、日化的生命經驗

李萬居生長於殖民地，而且極度認同中國為祖國。但他「解殖」的關鍵途徑，卻是到上海、法國接受現代化的非中國（Non-Chineseness）教育，也就是使自己歐化（Westernization）。藉此，他回國參與對日抗戰，成為無可爭議的國家功臣。主觀的中國認同臻於高峰，客觀上也足證自己中國身分的正確與真實。於是，運用西方的理論、主義追求中國的民主，既不矛盾，也不妨礙自己「身為中國人」。因此，李萬居對中國的認識歷程始於中國境外（日本殖民地台灣），後決定負笈海外，改造自己，進而認識中國、完全成為中國人並使台灣重返中國。

7 「有一天早上十點鐘左右，有一輛載滿阿兵哥的公共汽車來找我父親，一群軍人將父親圍住，並將父親身上配掛的國大代表徽章扯掉，還打他耳光... 後來聽人提起，說是那次本來要抓我父親去槍斃。」（陳儀深訪問，2008：頁 53）

在實踐中，與抗戰勝利之前相同，視中國為祖國的李萬居，其中國觀幾近於中國認同，而中國人的道德義務（抗戰、救國）尤為重要內容。如後所述，細數他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更可悉知，民主政治的價值是他評價中國的重要量尺，亦力求朝此方向改變政治。此時的他，也已與民初知識份子不同，「民主」與民族認同不再互斥（石之瑜，1997：頁 68），因為中華民國身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已經晉身西伐利亞國際關係的頂峰，而中國文明已然順利進入「主權國家」體系。

若以當時代日本人的身份觀察，國家主義則是多數主流<sup>8</sup>，如日本知識份子翻譯家二葉亭四迷（Futabatei Shimei），只有國族對象的不同，但兩者皆「把國家的問題當作自己的事情，展露自己與國家的一體化傾向，對於圍繞着國家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熱情和關心」（李冬君譯，松本三之介原著，2005：頁 12），以及細看兩者皆有類似之「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到民主政治」的思想認同軌跡。日後，李萬居堅持議會民主制度的精神，也相當近似河野廣中（Kono Hironaka）、片岡健吉（Kataoka Kenkichi）的《允許開設國會請願書》的思路。<sup>9</sup>

上述之認識脈絡為二十世紀初知識份子共同經驗，但若僅此為止，則李萬居僅重複殖民母國（日本）的主流意識型態（民族主義），反而陷入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所指稱的，政治經濟去殖，但文化上永陷殖民泥沼的狀況，又是甚麼動力讓他能真正超越這種「後殖民」呢？原因在於，抗戰勝利後，台灣社會結束「殖民」身份，此時李萬居認為面對中國界定自己已非問題，毋須因為「曾有殖民經驗」，而產生羞赧的情緒。當時李萬居相當期待中國「收復

台灣」：「前年（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中、美、英三國領袖共同發表宣言，戰後台灣與澎湖歸還中國。今天距該會議時間已經一年以上，可是中央當局除了成立一個規模不大的台灣調查委員會外，其他應該積極準備的機構，至今還未見成立，甚至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法律上的地位、台灣人民的身份，到今天還沒有確定。...無疑地台灣澎湖都應該重新併入中國版圖，這不只是台灣革命同志的呼聲、願望，而是台灣六百多萬人一致的要求。」<sup>10</sup>（鄭梓，1990：頁 80）

上述發言，一方面表露了抗戰勝利、打敗日本的喜悅；另一方面也體現他對「殖民」此一身份的焦慮，並亟欲透過主權、法律的手段徹底肅清。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身份與中國人認同並不一致，但戰爭結束後之後必須合而為一。究竟前殖民地及其人民，如何完成身份的「解殖」，從而「回歸祖國」，是當時知識上之一大問題。對此，李萬居的解答是「民主」，基於此一超越性的普世價值，就存在比之中國本土「更加中國」的可能性，毋寧自尊自盈。李氏戮力投入民主政治，一種隱然內斂的動力，也就漸見清晰。

### 3 民主運動與理想中國

戰後，身兼政媒雙重使命的李萬居，素以「正直無私、勇毅仁慈、崇尚民主、熱愛中國」（鄭士鎔，2001：頁 100）的人格特質為鄉親周知。1953 年，李氏就在臨時省議會的一屆三次大會中，如此質詢中國的民主政治：「...自由中國的台灣，對於各種選舉的干涉，愈來愈加厲害。過去對於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無不加以干涉，那可不必論。最近以來，連人民團體如醫師公會、婦女會、進出口商公會、商會理監事的選舉，甚至如鄉鎮長和里長的選舉，也無不被干涉控制。請問主席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這種表現嗎？...因為對於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都加以干涉控制，其

8 明治時代，部份日本在野人士信奉國家主義，儘管具有平民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質，但國家主義也是朝野之間思想的共性，且往往成為雙方矛盾緩解的切入點。（李冬君譯，松本三之介原著，2005：頁 9-11）

9 全國要真正統一，就必須使國民同其利害，一其心志，共愛一國，而使國民同其利害，一其心志，共愛一國之道，惟有開設國會而已（李冬君譯，松本三之介原著，2005：頁：53-54）。

10 原文載於《台灣民聲報半月刊》，第四期，頁 1。

結果，在各級議會裏面，都成為清一色，變成一黨包辦。請問主席，這可以叫做民主政治嗎？」（歐明憲，龔宜君，2001：頁 124-125）

一以貫之的黨國體制，使得「政黨」一詞成為負面價值，終於讓李萬居在五年後斷言，台灣的「政黨政治已經破產了！」（歐明憲，龔宜君，2001：頁 187）。但是，他從未質疑「不民主的中華民國」做為「中國」的資格。

韓戰爆發之前，國民黨政權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援，戮力維護「自由中國」的正面形象，使得台灣 1950 年代的政治自由，遠較美中簽訂《軍事協調諒解協定》之後的 1960 年代更高（彭懷恩，1987：頁 72-73）。根據謝漢儒回憶，某國民黨官員便曾經說：「如果韓戰上半年爆發，台灣絕不會舉辦地方自治選舉」（謝漢儒，2002：頁 102）

隨着民主政治漸成具文，李萬居在臨時省議會一場對省主席周至柔的質詢當中，開始就「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實質內容，提出反思與論說。從意識形態<sup>11</sup>、言論自由<sup>12</sup>、甚至是想像中的中國具體範圍<sup>13</sup>來看，李萬居正在表露、建構一種新的、理想的「中國」。

根據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憲法為國根本大法，與國之存亡相始終」（孫中山，1985：頁 400）。但當時的國民黨，一方面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效力；另一方面則以「總統三連任」帶頭違憲毀憲。李萬居對此表示反對，但縱然反對

11 「... 民生主義定義可否修改的問題... 為甚麼，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民生主義下定義說「敵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呢？民生主義是不是與共產主義沒有區別？如果沒有區別，為甚麼我們要反共呢？...」（歐明憲，龔宜君，2001：頁 175）

12 「... 由共匪迫害智識份子所引起的議論，大陸淪陷八年以來，凡是對共匪作風表示不滿或稍微反抗的智識份子，都被清算和迫害.....台灣呢，有不少為政府所不滿，但又無論如何加不上紅帽子的人，則都被加上了刑事犯帽子而受到打擊.....大陸迫害智識份子和台灣對付智識份子（我直覺認為，此善於被，所以替他們用『對付』字眼）的手段究竟哪邊高明？這些話不知道主席聽過沒有？」（歐明憲，龔宜君，2001：頁 176-177）

13 「... 目前自由中國的領土，除了台灣一省外，還有其他幾個小島嶼，論面積與過去大陸時代簡直不能比較...」（歐明憲，龔宜君，2001：頁 187）

未遂，他也從未捐棄青年黨人「諍友」的自持<sup>14</sup>，終其一生都在體制內推行民主政治。由於青年黨、民社黨<sup>15</sup>長期以來徒具在野黨之名，實質作用微弱，因此一貫堅持議會民主制的李萬居，在 1959 年參與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為此，他特地為文「正告中國國民黨人士」，宣佈新政黨必定是「民主的、反共的、愛國的」（台灣省議會秘書處，1960：頁 770）。即便他在議場的語言愈發激烈，但始終不反政府，還是回到「安定人心，促成軍民密切合作，能對政府效命，為反攻大陸作準備」相符（戴宛真，2009：頁 68）。也就是說，即便他十分反對當時的主流政治，但是始終揭舉更上位的「理想中國」，而非丟棄中（華民）國。<sup>16</sup>

#### 4 民主與祖國

在人生步入暮年，而民主政治愈發受挫之際，李萬居的言行字句始終沒有脫離民主的推行。對此，學者陳儀深認為，李萬居政治思想的基調是「民主超越了國族」，且「他支持祖國『光復台灣』，既然不只是反抗異族的統治而已，更是為了台灣人的自由、民主、人權」。李萬居在《台灣民聲報》的書寫，或可為一有力的釋義：「收復之後，應與國內同時施行憲政，立即給予台灣同胞以政治、經濟、教育、工作的機會均等，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鄭梓，1990：頁 83）

其子李南雄曾推斷，對於李萬居而言，「民主自由的觀念」比起主權特徵的中國，更加優先。所以，雖然他從未支持台獨，且堅

14 「青年黨自民國十二年成立以來，本是國民黨的諍友，而不是國民黨的政敵，該黨向來信仰國家主義，以『國家高於一切』為中心思想，向來主張民主的政黨政治。」（徵音，1938：第五版）

15 中國民主社會黨，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建黨，當時與青年黨並列台灣兩大在野黨。

16 嗣後，軍事法庭判處雷震十年徒刑，儘管李氏為此四處奔走，結果仍與組黨相同，徒勞無功。1970 年 9 月，雷震出獄後，頭號大事便是尋找李萬居的後人，其次則是翌年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中華台灣民主國」之議。（楊鎮麟，1993：頁 314-321）

定反對「兩個中國」（傅正主編，雷震原著，1990：頁 315），但國共兩造，做為中國政府，都未被完全認同，因其皆非「民主自由的中國」（陳儀深訪問，2008：頁 11）。李萬居在 1957 年《公論報》的報慶紀念社論〈十年如一日〉曾如此說：「... 台灣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酷統治之下，我們的先人以至我們不斷地奮鬥，犧牲無數生命，以求者，也不外是在日本人壓迫統治被推翻之後，才有實現可能的民主與自由；不只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我敢肯定說，是民主主義的偉大時代，它的思想潮流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楊錦麟，1993：頁 207）

那麼，在觀念上「民主超越國族」至為明顯的李萬居，為何在當時現實難以實踐民主，且短期無改變可能之狀態下，仍舊自願置身其中，拒絕擺脫中國？因為自幼時始之國學啟蒙、日本殖民壓迫開始的，文化性質的中國認同甚深（陳儀深，2001：頁 10）。儘管思想的許多內容不斷演變，但始終都是「為了理想中的、民主的中國」。

易言之，殖民性之於李萬居，前期體現為排拒日本，從而認同中國，尤其是歐化式的理想中國，但此時對民主的需要尚淺，定位不重，還是以抗日保台、富國強兵等現實主義思維為優先。1949 年之後，台灣實際上回到「中國」範疇，他卻又感到後殖民的困擾持續發生，從而在思想上以民主為指標，而且以救國為目的，以參與議政、獨立辦報、籌組新黨等行為，督促批判中國。每當李萬居心中的理想中國，與現實上的政治實踐產生矛盾時，他就益發運用民主超越，繼續堅持國族認同。

#### 四 李南雄：科學超越國族

##### 1 生平與學思背景

李南雄為李萬居之子，1940 年誕生於香港九龍醫院（《逸林》編輯委員會，2000：頁 3），是香港政治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李南雄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 24 年，其中六年兼系主任。1993 年曾經返台，創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任所長、教授。2000 年自中大退休，重返該校擔任五年的政治學系系主任、教授。目前定居於美國加州。

李南雄的研究範圍，涵蓋中國研究、公共組織與管理、組織理論與行為、公共政策、比較政治、人事行政與社會科學的哲學等諸多範圍。他在英文、中文、日文、韓文的學術圈中也有一定知名度（包淳亮，2009：頁 5）。李南雄自身曾於中大逸夫書院的訪談中自稱「香港出廠，台灣加工，美國包裝」（黃祖兒，2008：頁 10）。並以「全球化」概括自己「法律上屬於香港人、在中華民國服完兵役，在台灣學校完成大學教育且擁有美國綠卡」的多重身份（包淳亮，2009：頁 6）。

在人生最初的 26 年，李南雄的個人生涯始終都與中國政治、家族以及台灣的現實密不可分。幼時，更曾因日軍侵華，走過一段在香港、兩廣、海南、重慶等地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涯，曾居住於陪都的經歷，也讓他學會了四川話。戰後，李氏家族遷往台灣，定居台北西門町地區兩年後，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涵蓋父母、長兄在內的家族成員，皆曾置身可能喪命的危險。當時其父辦理之新生報社內，也有許多人遭受衝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74-177）。

嗣後，初中時期的李南雄，住家「瀨園」燒毀，一家六口無家可歸，李萬居自況的「毀家辦報」四字，可謂一隅縮影（李萬居，1954：第一版）。因此，高中時期的李南雄，開始接觸《民主潮》、《自由中國》等黨外雜誌，也曾在學校的週記中質疑一黨獨裁而引

起校方注意（陳儀深訪問，2008：頁 54）。考入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後，他陸續閱讀了《飲冰室合集》、《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國演義》、《資治通鑑》、《國史大綱》等中國古典名著，同時頗受柏楊、李敖批判中國文化（如醬缸論）的啟發（包淳亮，2009：頁 3、8、10）。透過省思歷史故事，李南雄深刻體認了「殘酷的」中國政治歷史，更對許多既有國族觀念產生懷疑（陳儀深訪問，2008：頁 54）。

儘管有雷震、高玉樹等政要名人頻頻在家中穿梭，但在當局打壓之下，李萬居慘淡經營的《公論報》仍逐漸走向倒閉的絕境。未幾，爆發「雷震案」之後，李南雄更目睹多名《公論報》同仁遭到迫害，或者獲判重刑，或者下落不明（陳儀深訪問，2008：頁 55）。翌年，「蘇東啟事件」爆發前夕，國安局將李萬居秘密列為「五人小組、幕後影武者」之一時（劉熙明，2000：頁 174），而在「蘇東啟事件」中，李南雄也受到相當之心理衝擊（陳儀深訪問，2008：頁 55）。

因此，綜觀其人在台灣的歲月，無時不刻籠罩於「政治迫害的恐懼」（李南雄，2001：頁 42），也促使他萌生去國之意：「六、七十年代，台灣還有所謂『白色恐怖』，資訊很封閉，《時代》、《新聞週刊》這些外國雜誌都不容易看得到。我不想回台灣去。」（《逸林》編輯委員會，2000：頁 3）1966 年，因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體認和反思」所引起之「政治學興趣」，李南雄選擇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政府系深造。一方面「重新學過」政治學；另一方面「跟着學術大環境走」——着手進行中國研究；個人首篇英文論文《1946-1948 華北的土地改革》歷時 22 個月付梓。依其自述，其餘碩士論文階段，「成為政治學與中國學之間的兩棲動物」。在學期間，他也涉獵了社會學、利益團體、政治哲學以及組織管理的理論讀物（包淳亮，2009：頁 10、13、57）。

1968 年，碩士班畢業後，李南雄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其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的工業政策」，鄒讜為指導教授。依其自

述，佛巴（Sidney Verba）教授的比較政治三門課、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有關法團主義（Corporatism，或譯統合主義）的啟發，使他頗感受用（包淳亮，2009：頁 15、20）。博士班時期，除了使他養成「批判習慣與能力」，接受「學術探討中人人平等」的觀念外，也形成一套與鄒讜不同的學術觀點。雖說如此，鄒讜仍舊引導了李南雄從韋伯、後韋伯角度的進行思考，也旁及「非正式人際關係分析」、「設身處地解讀行動者的主觀意思、下苦工收集分析書面文字的原則」等「中國學的看家本事」（包淳亮，2009：頁 17-18）。1972 年，李南雄在學生時期，曾參加中國訪問團，並獲當時總理周恩來接見（Lee 1981a: p. 32），是當時難得的體驗。三年後，他博士班畢業，於同年年底返回出生地，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

## 2 學術研究經緯

1970 年，躬逢第二十五任香港總督開啟的「麥理浩時代（MacLehose Years）」，繁榮的香港陸續迎來廉政公署成立（1974 年）與英國女王訪港（1975 年）等時代大事（呂大樂，2007：頁 99-100）。1976 年，李南雄博士抵達中大任教；同年中國大陸政治動盪（張戎，喬·哈利戴，2006：頁 566），中大的左派學生痛感信仰破滅（楊耀忠，林建杜，1996：頁 108），低迷的氣氛瀰漫校園。<sup>17</sup> 1970 年代末，在香港社會的「第二次中國熱」落幕之後，社會的激情，被警察腐敗問題、「九七大限」提上中英兩國談判桌所全面冷卻，香港人的身份焦慮自此彰顯（羅永生，2007：頁 10）。香港人逐漸關注「政治社會」（關信基，1998：頁 100-106），也提昇了政治學家在香港傳媒的積極作用。

最初十年，李南雄特別強調社會科學不能範定中國的特殊性，比如毛主義（Maoism）的獨特性（Lee 1981b: p. 35）。研究「四人幫」，

17 「從 76 年 1 月至 10 月，許多同學痛哭、激憤以至迷茫，然後校園換來罕有的寧靜。」（何冠環，2006：頁 127）

定義研究對象的角色時也不能脫離中國的政治環境 (the Chinese Political context) (Lee 1977: p. 70)。而「群眾路線」(mass-line)更是中國用於「大規模群眾運動途徑」的術語 (Lee 1979a: p. 101)。此外，在一篇「中國現代化與管理權」的研究中，他也特別說明——「在中國環境中，管理和專業階層為政治機器的子句，且服從政治統御」(Lee 1979b: p. 71)。同時體察他對「中國工業部門參與危機」的研究內容，也透漏了他對西方理論是否適用中國個案的懷疑 (Lee 1979a: pp. 119-120)。類似的思維，也可見於他有關中國民主法制、人權概念、法律名詞等「不可以(與西方)等量齊觀」的斷語 (李南雄 1987b: 26)。西方學者約翰·路易斯 (John W. Lewis)、弗朗茨·舒爾曼 (Franz Schurmann) 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也是他為文研究的對象之一 (Lee 1979b: p. 71)。

儘管如此，西方政治學理論，仍是他的分析工具。比如李南雄認為「四人幫」是「中國激進政治的起源」，而「激進政治」的定義，則是根據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與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的研究而定 (Lee 1981c: pp. 70-72)。此外，有關中國現代化研究，則存在許多「官僚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這一類的主題 (Lee 1981b: p. 32)。其餘諸如使用「政治現代化」觀點研究香港警察腐敗 (Lee 1981c: p. 167)，主張「腐敗源於現代化建設」，肯定韋伯「傳統中國官僚機構其實比封建歐洲更現代」之說 (Lee 1981c: Conclusion)，都是常見的寫作。

李南雄的中國研究論文裏頭使用多種西方社會科學途徑，如法團主義的解釋 (李南雄，1987b: 頁 24)，派系政治的分析 (李南雄，1980: 頁 4)，以及林布隆 (Charles E. Lindblom，或譯林伯隆) 所提出的「綜合性的模型 (Symptomic model)」 (李南雄，1981b: 頁 63)。又，以其「文革」研究為例，又可發現特重「制度」因素——此一與「特殊性」對立的「普遍性」 (李南雄，1987b: 頁 25)。談及中國的民主化，他也認為應該「由具體的制度問題着手」 (李南雄，1982: 頁 34) (李南雄，1983: 頁 10)。跳脫理論層面，

李南雄亦呼籲：一個開放的政府才可能是負責的政府，北京政府的第一步，就是對歷史負責，建立制度。根植於生活經驗，他對英國治下的香港政府「有法律制度可循，政策方面又卓有績效，貪污浪費情況極少見...」且「提供之服務與福利範圍頗大」等種種實績，相當肯定。出於「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他也提及「政府不妨學習這些長處優點」 (司馬長風等，1980: 頁 370)。易言之，李南雄表現出在學術與社會運動上的關心。<sup>18</sup>

時間進入 1980 年代，香港「回歸」成為重要的政治問題，港府也出現了「過渡性」與「民主化」的徵象。不少民族主義傾向較強的中大學生，紛紛發動集會遊行，高呼打倒「不平等條約」，反對英國的繼續統治 (羅永生，2007: 頁 107、120)。於此同時，香港的社會生活也次第進入「現代化工業城邦文明」的範疇，與中國大陸愈發不同。港府頒布《廉政公署條例》(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Ordinance) 將「送禮」從社交秩序中拔除 (陸鴻基，2005: 頁 69) 之後，港中兩地對比，兩者對「法治／關係」上認知差異甚大，因此中國工業管理、非正式政治也就是李南雄此時研究課題的大宗。1987 年出版的專書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49-1984* 可謂代表之作。1993 年在美國芝加哥一場研討會中的會議論文，更是學界「法團主義適用中國個案分析」的先驅之作 (包淳亮，2009: 頁 20)。

李南雄指出，中共的「非正式政治」是始自革命時期的慣例。即使到了 1980、1990 年代的當下，此一慣例也已適應嶄新的政治環境，並甄選出了胡耀邦、趙紫陽與江澤民等一系列領導人 (Lee 2001: p. 181)，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他認為，學界有關中國非正式政治的研究方法與定義，有商榷的餘地。諸如「派系鬥爭」(factionalism) 與「關係」(connections，也有論文寫為 guanxi) 的

18 這個特質亦為李南雄談論先父中所提及：「從他對於學術工作的觀點言之，一方面他亦尊重學術工作的客觀求證，另一方面他亦強調學術社會作用，這與近年來西方所談「社會相關性」觀點頗相近似。」(李南雄，1981c: 頁 243)

內涵，皆有待確定。在他回顧自己近似「後輩伯」的「腐敗」概念，亦批評毛澤東的「官僚主義論缺乏準確性」（包淳亮，2009：頁 21）。

1993 年，海峽兩岸展開「辜汪會談」，李南雄在工業管理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將研究對象擴及退休制度、醫療服務、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私有化等公共政策研究領域。依其自述，雖然課題不同，但方法上依舊承襲以往「從宏觀入手分析公權力行使」，以藉此探討「公共組織與管理的問題」。同年發表的論文〈Reform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探討了中國社保制度的醫療服務、退休金與城鎮住房問題，一系列研究成果匯總於 1995 年出版的專書 *Housing Privat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改革的「走走停停」（stop and go）、「穩定 V.S.改革」的經濟政策衝突、「三角債務」（triangular debts）、結構調整與企業重組、社會主義經濟週期（Lee 1993: ch.9.3）、做為「國企改革晴雨表」的年薪制（Lee 1998a: pp. 187-188）、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宏觀經濟調控（Lee 1998b: pp. 22-23）、退休保險（Retirement Insurance）、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等「中國的決策者面臨的龐大問題」（Lee 2000: p.109）都涵蓋其中。

同一時期，為完成一個大型的「中國城市管理研究」計劃，李南雄與許多香港學者，共同組成一個跨校、跨專業的研究團隊。2000 年，其成果出版為專書 *Rema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依其自述，這一本書「將中國學引進了公共組織和管理的觀念和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包淳亮，2009：頁 20-21）。而他在與羅德明（Lowell Dittmer）、福井治弘（Haruhiro Fukui）、翁松燃、吳玉山等人合作的另一項研究中（Lee 2001: p. viii），則主責中共高層權力繼承此一「非正式政治」的課題。2001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為專書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包淳亮，2009：頁 17-19）。

李南雄最初的中國觀，始於家庭環境所提供的政治經驗，並在中國文化的教育制度中，成為依其自述之「文化上的中國人」（包淳亮，2009：頁 13）。26 歲，負笈美國，則讓李氏的中國觀從「切

身經驗」跳脫，確立了根植於西方社會科學的內容。身為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的他，貌似與身為政治家，推行民主政治的父親不同。但事實上，他們都選擇了普世價值來超越「中國」。

### 3 科學的中國觀

「科學」在本文之意義，是指以客觀、有系統方法等社會科學的工具及研究態度，觀察中國。為何稱其可「超越中國」，則是因為中國學（China studies）本身就是西方產物（石之瑜，1997：頁 43），亦常以「科學化的中國」為前提來判斷中國（尚慶飛，2008：頁 9）。因此，在社會科學範疇裏去討論中國，自然不免有西方中心傾向。意即，現代科學源自西方文明，所以運用科學研究中國，就難免萌生「如何使中國更像西方」這種「科學化」的關懷。

緣此，研究者必將比較中國人與西方人，並認為兩者間具有「差距」（石之瑜，1997：頁 60），就像李南雄多次以英國舉例，來要求中國；在社會實踐上，涉及價值判斷較多的「評論」時，李南雄也徵引科學理論（李南雄，1987b：頁 24）；諸如運用「一元主義」批判黨國體制（李南雄，1981a：頁 16）、科學分析經濟犯罪（李南雄，1984：頁 31-32）、根據論文提出政府機構改革建言（李南雄，1987c：頁 52）、運用管理學探討中共政改（李南雄，1987c：頁 54）、運用公共管理解釋行政集權（李南雄，1987a：頁 52）。

總體觀察歷年論文、評論與受訪的內容，也能發現，不同時期的李南雄，面對中國的態度也各不相同。在「主張中國特色」⇔「以西方經驗檢驗中國」⇔「批評傳統中國」的軌跡當中，西方主流價值的作用可謂愈發吃重。儘管相當依賴「制度原因」的解釋力，但後期也認可了美國同行早已不斷批評的「法制、民主」等等問題（包淳亮，2009：頁 23）。顯然，即使自認以中國人的身份、中國人的立場，運用科學，研究中國，如李氏一貫偏好公共行政、社會政策的研究取徑，但其因為科學研究方法使自己的中國性減弱。



然而，正是「超越中國的科學」，使一度決定遠離中國文化的李南雄，取得了中國觀的新內容，並與以「中國」為最初觸媒的政治學之路合流，置身香港。並做為一位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者，以西方學者所不具有的文化、身份與認同，發揮人稱迴避倫理關係分裂的「科學普世主義」的作用（石之瑜，1997：頁72）。李萬居的經驗揭示的是，後殖民的困擾可能來自於「情感上之祖國」。全程旁觀前者經歷的李南雄，則早於香港回歸（中國來臨）前，傾其26年的香港學術時間，透過學術研究，以「科學」超越中國，此間行止，厥為其人的後殖民主體歷程。

## 五 結論：兩代知識份子之後殖民體驗

港台先後隸屬不同殖民母國，成為殖民地，嗣後，與一般「結束被殖民」的前殖民地不同，港台並未獨立建國，而是分別回歸。其中，「祖國」與「前殖民母國」的外來姿態，及其自身（前）殖民地主體性之間，相互衝擊。因而對港台兩地的知識份子，乃至整體社會構成一道後殖民的難題。

由於港台的特殊經驗與世界大多（前）殖民地案例相當不同，近年來，兩地各自衍生「重新被殖民」或者讚揚前殖民母國統治的聲浪，對於「殖民／後殖民」的討論亦不只是學術議題，而成為政治社會議題。此一現實，也讓西方後殖民理論突顯其解釋力的侷限性。因而，本文有關李氏父子的東亞經驗探討，能夠補遺。對此，本文作者之一曾於前著提出，李氏父子在文化中國的範疇中，以來自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學研究」價值做為「中國人」的自己，將「中國概念」昇華，足以超越「祖國之中心／邊陲」差異。當時作者企望說明殖民之後的知識份子認同的浮動性與解構。本文則進一步深入李氏父子兩代的歷程，揭示了「中國觀」在港台特殊的殖民經驗中，所具有的實證與社會意義。並在前述基礎上，進而闡述，中國對於他們的心理意義，在於中國做為主體（我自己），又去對

中國實踐西方普世價值（民主／科學），主客體合一，使得他們與同儕政治人物、或「中國學」學者都有些不同，可稱為東亞「殖民之後」（after colonial）之特殊歷程。

獨特的空間，獨特的身份，以及獨特的心理意義所致生的獨特的實踐歷程。綜觀而論，就是一種以西方普世價值的科學或民主來「超越殖民」的後殖民主體辯證路徑。本文指出，李萬居在1945年之前，以民族主義反抗日本，但戰後卻以民主的普世價值，讓自己超越殖民。而李南雄雖為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從不懷疑自己的民族歸屬，且現實中又反省中國文化，自認為「文化上的中國人」，主要藉由社會科學等「西方普世價值／西方典範」在思想上超越「中國」。本文闡述了兩代李氏父子面對後殖民體驗中，都選擇獨特的實踐方式，用以證成自身主體性之歷程。

## 參考文獻

### 中文專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文裕（1997）：《李萬居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王向遠（2005）：《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北京：嘉尚出版社。
- 石之瑜（1997）：《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台北市：風雲論壇。
- 呂大樂（2007）：《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冬君（譯），松本三之介（原著）（2005）：《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北京：東方出版社。
- 李英明（2003）：《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縣：生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尚慶飛（2008）：《國外毛澤東學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林渝文（主編）（2001）：《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市：樂學書局。
- 張戎，喬·哈利戴（2006）：《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
- 曹莉（譯），史碧娃克（原著）（1999）：《後殖民批評家》，台北縣：生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陳先奎（2011）：《2011 思想政治理論標準輔導全書》，北京：新華出版社。

- 陳芳明 (1992)：《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 陳國祥、祝萍 (1987)：《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社。
- 陶東風 (2000)：《後殖民主義》，台北縣：揚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傅正主編，雷震原著 (1990)：《雷震全集 (40) 第一個十年 (八) 雷震日記》，台北市：桂冠圖書。
- 彭懷恩 (1987)：《台灣政治變遷 40 年》，台北市：自立晚報社，1987。
- 黃良平 (1981)：《永懷李萬居先生——記一位民主自由先知先覺者》，台北市：甘地出版社。
- 楊瑞光 (1981)：《珠沈滄海：李萬居先生傳》，台北縣永和鎮：文海。
- 楊錦麟 (1993)：《李萬居評傳》，台北市：人間出版社。
- 歐明憲、龔宜君 (2001)：《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台中縣霧峰鄉：台灣省諮議會。
- 謝漢儒 (2002)：《台灣早期民主運動與雷震記事——為歷史留見證》，台北市：桂冠圖書。
- 羅永生 (2007)：《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文專著內之篇章

- 何冠環 (2006)：〈我在聯合的日子〉，李振軍 (編)：《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中文大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 127。
- 李茂祥 (2003)：〈緬懷「民主先聲」李萬居先生暨李萬居故居精神啟蒙館紀念館啟用典禮大會手冊〉，雲林：出版項不詳，頁 9。
- 陸鴻基 (2005)：〈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沈玉儀：《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頁 69。
- 龍應台 (2006)：〈想像人文港大〉，林立新 (主編)：《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大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 237。
- 陳翠蓮 (2006)：〈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結社與政治生態〉，國立編譯館 (主編)：薛化元 (編)：《《公論報》言論目錄彙索引》，台北市：文叢書局，頁 322。
- 薛化元 (2006)：〈導論〉，國立編譯館 (主編)：薛化元 (編)：《《公論報》言論目錄彙索引》，台北市：文叢書局，頁導論 VI。
- 梁文道 (2009)：〈有夢想，但夢想甚麼？〉，許知遠 (等著)：《單向街 001》，南京：鳳凰出版社，頁 43。
- 關信基 (1998)：〈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劉青峰、關小春 (編)：《轉化中的香港：身份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00-106。
- 孫中山 (1985)：〈在宴請美領事會上的講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 (合編)：《孫中山全集 (第 4 卷)》，北京：中華書局，頁 400。
- 楊耀忠、林建杜 (1996)：〈使命與責任〉，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寬、王編：《明德新民——聯合書院四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頁 108。

中文期刊

- 王寧 (2003)：〈全球化時代的後殖民理論批評〉，《文藝研究》，2003 卷 5 期，頁 19-27。
- 王嶽川 (2000)：〈香港的後現代後殖民思想脈絡〉，《文藝研究》，2000 卷 6 期，頁 19-40。
- 石之瑜 (1995)：〈陰性主權：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起點〉，《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11 期，頁 24-38。
- 夏鑄九 (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0 期，頁 47-82。
- 徐經論 (2007)：〈略論「中國性」問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154。
- 張君攻 (2009)：〈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重探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幾個面向〉，《文化研究》，第 9 期，頁 5-44。
- 陳春燕 (2008)：〈時間與他者——後殖民全球化的「當下」〉，《英美文學評論》，第 13 期，頁 119-155。
- 葉郁善 (2007)：〈台灣移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國際文化研究：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3 卷第 1 期，頁 55-76。
- 劉熙明 (2000)：〈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台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頁 174。
- 劉曉晴 (2013)：〈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頁 150-151。

中文雜誌

- 《逸林》編輯委員會 (2000)：〈謙謙君子 溫然如玉——李南雄教授專訪〉，《逸林：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通訊》，第 6 期，頁 3。
- 中外名人傳編輯委員會編撰 (2000)：《中外雜誌》，第 67 卷第 1 期，頁 79。
- 司馬長風、董千里、朱立、朱惠濱、徐東濱、李南雄等 (1980)：〈中國大陸的倒春寒 (時事座談)——取消「四大」，中共再度縮緊〉，《中報月刊》，頁 370。
- 李南雄 (1980)：〈列根大勝與美國今後的政治路向〉，《明報月刊》，頁 4。
- 李南雄 (1981a)：〈「建國政黨」的問題〉，《亞洲人》，1981a，頁 16。
- 李南雄 (1981b)：〈歷史評價與中共政策——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問題〉，《明報月刊》，頁 63。
- 李南雄 (1982)：〈廣泛參與和有效決策〉，《八十年代》，頁 34。
- 李南雄 (1983)：〈中國新憲法的理想與實際〉，《中報月刊》，頁 10。
- 李南雄 (1984)：〈中國公務人員的罪與罰〉，《明報月刊》，頁 31-32。
- 李南雄 (1987a)：〈從決策理論看中國工業宏觀管理政策之出路〉，《明報月刊》，頁 52。
- 李南雄 (1987b)：〈從五屆人大看中國民主法制問題的緣起〉，《南北極》，頁 24-26。

- 李南雄 (1987c) : 〈從十三大會議看中共政治體制改革〉, 《信報財經月刊》, 頁 52、54。
- 連溫腳 (1953) : 〈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台北文物》, 第 2 卷第 3 期, 頁 70。
- 黃祖兒 (2008) : 〈訪李南雄教授——跟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一份「緣」〉, 《聯合滬進》編輯委員會, 第 3 期, 頁 10。
- 微音 (1938) : 〈與國民黨共患難〉, 《國論》, 第 15 期, 第五版。
- 台灣省議會秘書處 (1960) : 《台灣省議會公報》, 第 3 卷第 18 期, 頁 770。
- 鄭士銘 (2001) : 〈李萬居與公論報(下)〉, 《傳記文學》, 第 97 卷第 5 期, 頁 100。
- 中文報紙
- 李萬居 (1954) : 〈在窮忙憂慮中度過的七年〉, 《公論報》, 1954 年 10 月 2 日, 第一版。
- 中文學位論文
- 戴宛真 (2009) : 《李萬居研究：以辦報與問政為中心》, 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頁 2、68。
- 中文網路文獻
- 包淳亮 (2009) : 〈李南雄〉,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tw-3.doc>, 瀏覽日期: 2009 年 5 月 22 日。
- 李筱峰 (2014) : 〈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129/35610113/>, 瀏覽日期: 2014 年 1 月 29 日。
- 中文研討會論文
- 李南雄 (2001) : 〈李萬居先生紀念館營運目標〉, 《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討論會》, 頁 42。
- 陳儀深 (2001) : 〈民主超越了民族〉, 《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討論會》, 頁 10。
- 陳儀深訪問, 潘彥蓉紀錄 (2001) : 〈李南雄先生訪問紀錄〉, 《台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討論會》(2001.8.12), 頁 11、53-55。
- 鄭梓 (1990) : 〈復台前夕祖國派台籍人士的最後言論與主張——以台灣民聲報為中心的初步分析〉, 《台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 頁 80、83。
- 英文專著
- Gayatri Spivak,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London: Routledge, 1996.
- H.C. Kuan, Maurice Bousseau [eds.], *China Review 199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英文專著內之篇章
- Lee, Peter N. S., (1993),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the Tienanmen Incident," in H. C. Kuan, Maurice Bousseau, eds., *China Review 199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9.3.
- Lee, Peter N. S. (1979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ss-line Leadership in China, 1956-1966," in Lee Ngok and Leung Chi-keung (eds.),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01, 119-120.
- Lee, Peter N. S. (1979b), "Modernization and Managerial Power in China, 1956-1966," in Steve S. K. Chin (e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 71.
- Lee, Peter N. S. (1981a), "The Sino-Soviet Dispute Re-examined," in Liao, K. S. (ed.), *Modernization and Diplomacy of China*. Hong Kong: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Centre, CUHK, p. 32.
- Lee, Peter N. S. (1981b), "The Modernization Programmes in the Three Poisonous Weeds," in Chan Edward K. Y. and Chin, Steve S. K. (e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Chin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32, 35.
- Lee, Peter N. S. (1981c),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lice Corruption: A Case i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Rance P. L. Lee (ed.), *Corruption and Its Control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70-72, 167. Conclusion.
- Lee, Peter N. S. (2001), "Informal Politics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during the Post-Mao Era,"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Peter N. 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viii, 181.
- Lee, Peter N. S. Lee (1977), "The Gang of Four: Radical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Steve S. K. Chin (ed.), *The Gang of Four: First Essays after the Fall*.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 70.
- 英文期刊論文
- Lee, Peter N. S (1998b), "Is Big Beautiful? Restructuring China's State Sector under the Zhuda Policy," *Issues and Studies*, Vol.34, No. 9, pp. 22-23.
- Lee, Peter N. S. (1998a), "The Nianxinzhi: Remunerating Corporate Managers in China's State Sector,"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2, No. 2, pp. 187-188.
- Lee, Peter N. S. (2000), "Popular Belief in State Intervention for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 29, No.1, p. 109.
- Rosen Menahem (1985), "Identité, différence et contradiction dialectiques selon Hege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3:4.